

试论

西方“战略文化”思潮

刘永涛

在西方,根据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略是指“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这个思想一直为西方国家所公认。所谓国家战略,一般指在平时和战时除了使用军队外,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对国家战略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要课题,其研究角度也在不断拓宽。“战略文化”是近十多年来西方国家在国家战略及国际安全研究方面出现的新思潮。它试图说明和强调国家战略与国家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从人文角度理解和认识国家的战略考虑及优先选择问题,可以说是西方研究者把文化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尝试。本文首先扼要叙述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起源、概念及演变问题,然后探寻该思潮的最新发展走势,最后就西方“战略文化”思潮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军事政治集团陷入冷战对峙状态,在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使整个国际社会笼罩在爆发核战争的阴霾中。进入70年代,尽管美苏关系随着两国频繁的高层谈判尤其军控谈判以及有关条约和协议的签订而有所缓和,但是,这种缓和“并没有制住核军备竞赛”。于是,一些忧心忡忡的西方研究者试图对爆发世界核战争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他们发现,美苏两个核军事大国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并试图说明其缘由。“战略文化”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一术语是1977年由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首次提出的^①,并认为该术语无论在构词还是在语义方面,明显套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政治文化”术语。众所周知,所谓“政治文化”,是西方政治学研究者在本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指政治系统中的成员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观念、认知、信仰、态度等社会心理定向,以及它们的理论形态政治思想的总和。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取向强调从广阔的社会意识形态主体方面对政治观念及行为进行分析和认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提出“战略文化”概念,则要试图理解和认识文化对国家战略行为的影响,从复杂的人文角度对具有跨学科性

质的战略问题加以阐释,解释处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诸国家可能存在的不同军事思想及战略决策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战略文化”是在特定的美苏冷战及核能力较量背景下产生的术语,这里的“战略”一词主要还是指与军事及战争有关的狭义战略概念。

什么是“战略文化”?“战略文化”起什么作用?研究它的目的什么?这些都是西方“战略文化”研究者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西方学术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表述。较早的研究者把技术、地理、组织文化及历史、传统的战略实践、政治文化、民族特征、政治心理、意识形态乃至国际体系结构等统统列入战略文化的范围,使其内容显得过于宽泛。后来有人认为,“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组织和部署军事力量时的传统实践及思维习惯,是地缘政治背景、国际关系、政治及社会文化、军事史以及军民关系等方面的产物。最近美国有人试图在批评前人定义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界定,认为“战略文化”是一个包括思维结构、语言、类比、隐喻等在内的完整符号体系,它通过提出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军事的有效性及其作用的概念并赋予这些概念以现实有效涵义的办法,来确立全面而持我的战略优先考虑。^②尽管这些定义内容或宽泛或细窄,或通俗或艰涩,侧重方面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战略文化”总的含义无非是说国家战略的形成过程受到国家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此外,西方“战略文化”研究者认为,每个国家因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着不同的战略文化,也就是说今天存在着美国的战略文化、俄罗斯的战略文化、中国的战略文化等等。“战略文化”形成有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因素,其成分来源包括国家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及政治、经济、技术等。^③

“战略文化”起到什么作用呢?战略本是一种带有目标性的活动,包括通过使用武力来谋求政治目的。一些西方研究者的兴趣在于想弄清楚“战略文化”是如何影响着这种带有目标性的活动的。有人认为,在了解实际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方面,仅对国家政策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国家的战略文化,研究使国家战略符合逻辑和可能成功的指导原则及观点的产生根源。^④这类研究的前提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能够解释该国家及军队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解释它在战争中输赢的原因。也就是说,“战略文化”具有说明和解

释的价值。传统的西方“战略文化”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存在着各自占支配地位的战略优先选择，而这些战略优先选择又是扎根于各自国家早期或形成时期的历史经验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各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政治、文化及认知特征的影响。相比之下，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所属阵营、相对的物质财力等这类非历史性或“客观性”因素则在国家战略优先选择中处于次要地位。换言之，要估计和考察一个国家的战略优先选择，必须首先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经历、研究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文化、哲学等在内的文化根基。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国家的战略优先选择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发生变化，那也是极为缓慢的，远远落后于实际环境的变化，因为国家的历史经历及文化根基是相对不变的东西。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西方“战略文化”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对不同国家战略文化的诸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第二，根据这些国家“战略文化”的特征，预测这些国家在战争中的可能后果；第三，利用“战略文化”研究的结果作为制订或规定国家政策的基础。

二

“战略文化”思潮在西方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其间存在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认识和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相互争论。根据美国学者伊恩·约翰斯顿的归纳，“战略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下面对其作一扼要叙述。

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西方研究者竭力想解释为什么在表面上看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核战略问题上存在着差异态度。

“战略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于8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研究者提出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即国家决策者所认为或表述的东西同他们实际所做的深层动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国家会一方面公开宣称一种战略（declaratory strategy），另一方面却实施着另一套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美国学者布拉德利·克莱因对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进行研究后指出，冷战时期美国核政策中存在着这种战略两面性：美国实际的核军事行动战略强调，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的政治霸权地位，美国可打核战争。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决策者指使政治精英们用国际社会可接受的语言和文化搞出一套供宣扬使用的战略，以达到安抚和误导外界、掩盖自身真实战略意图的目的。因此，这个阶段的研究者既承认“战略文化”是国家历史经验的产物，不同国家因有着不同历史经验而存在着不同的“战略文化”，但又认为“战略文化”与国家的实际战略行为之间可能是脱离的，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其说受“战略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决策者对国家利益进行考虑后作出的反映。换言之，国家战略的选择主要是依据国家利益而确定的。

第三个阶段始于90年代。这时的研究者一般

借用军事文化学、政治—军事文化学以及组织文化学边缘科学的理论成果，通过案例研究对特定的国家战略选择作出解释。他们试图摆脱文化决定论的束缚，强调文化是扎根于国家近期的经历中的，政治—军事文化是变化中的国内政治背景的产物，是随着国内政治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像传统的研究者认为是扎根于国家的历史经历中的。^⑥

从上述对伊恩·约翰斯顿关于西方“战略文化”思潮三个阶段归纳的扼要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战略文化”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个早期的被接受到中期的受怀疑再到后来被折中认可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总体上看，西方“战略文化”的研究仍基本处于探讨的阶段。

三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出现一批新的“战略文化”研究者，“战略文化”思潮在美国似乎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下面侧重当前美国学术界在“战略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分歧、“战略文化”国别研究重心的调整和变化，以及研究取向等问题加以探讨。

如前所述，传统的“战略文化”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因此，国家的战略及军事行为由于这种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近来有研究者对此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反对关于存在文化及历史因素对战略决策精英主观大脑发生影响的说法，指出不同国家军事行动及世界观方面存在的差异看上去是由于不同文化及历史经历所引起，但是若经过仔细观察，要么不存在这种差异，要么可以用非文化因素去加以解释“文化不影响战争的行为和理论”。^⑦这种观点大体继承了前述第二阶段研究的观点，但比其走得更远，因为从表层的文字来看，它完全否定了文化历史在国家战略形成中的作用。持这种否定观点的人指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可能对同种事务存有类似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战略文化”理论推崇者想侧重对精英集团大脑中的主观想法进行研究，这是给自己制造难题，因为他人脑子里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强调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不是文化对国家战略思想及行为的影响，因为社会结构是可观察到的东西。^⑧这种观点的理论前提是，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如何相处，影响着社会成员之间彼此采取的行动；它也影响着政府部门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以及对战略的选择。

另一些研究者则坚持认为“战略文化”在解释国家战略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强调文化在国家军事思想中的作用，指出一个国家选择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守，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换言之，文化对国家战略问题仍有着重要的解释价值。还有人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符号作用，指出“战略文化”是可能存在的，但是不一定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不同的国家由于拥有共同的认同创造过程而可能具有共同的战略文化，而且，符号的战

略，即宣称的战略与实际战略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战略文化”与实际战略之间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①这种观点不但继承了前述思潮第二阶段的想法，而且代表了目前美国学术界“战略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折中态度，既承认“战略文化”的存在，又承认人类存在共同的认知能力的现象。

对哪个国家的战略进行研究，这是有所选择和有所偏重的。人们一般重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对本国利益构成较大影响国家的战略进行研究。因此，不同时期战略研究的国别对象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战略文化”思潮方面，情况也大致如此。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国别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转移。冷战时期，西方研究者加紧对前苏联国家“战略文化”的理解和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前苏联国家解体及东欧巨变，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亚太地区成为冷战后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展开经济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也面临着同日益增多的非欧洲文化传统国家在战略上打交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学者逐渐从对前苏联国家“战略文化”的传统研究转向对亚洲国家尤其转向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理解及研究。其主要原因有：首先，近年来，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贸易获得迅速发展，尤其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令世人瞩目，既有为之高兴者，也有为其惶惶不安者。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些人依据所谓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可能转换成发展军事实力的理论，在不同场合散布中国有可能成为地区性军事霸权国的言论，“中国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一些西方研究者则想从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和历史经历中发现或证明中国是否属于在军事战略上是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国家。其次，随着亚洲经济市场的开放，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需要同亚洲国家加强联系和交往，同亚洲国家之间的战略接触也增多。但是，一些亚洲国家的国内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因此，已经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东西方国家之间发生误解、分歧甚至冲突。这也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和历史进行认识和研究。

四

西方“战略文化”思潮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正反不同方面的争论主要围绕文化在解释国际关系，尤其解释国家战略方面的有效性问题展开。应该说，“战略文化”研究目前在西方仍处于探讨阶段。不管怎么说，西方“战略文化”思潮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西方传统国家战略选择模式对国家历史及文化因素不给予足够考虑的缺陷，就其开拓新的研究视角而言，有其一定的学术价值。

当然，国家战略的最终形成有一个极为复杂

的思维及决策过程，其影响因素和作用力也是多方面的，需要人们利用多种现存以及探索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解释和预测。西方“战略文化”思潮只是反映了西方学术界中一种研究思路。应该承认，国家之间关系所依赖的国际环境结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及经济、国家实力等仍然是国家对战略作出现实选择的重要依据。西方“战略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这种文化研究取向能较为准确地解释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达何等程度。如果说国家“战略文化”本身是一个客体，但是，对它进行理解却是一个主观认识过程。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各国都认为自身的战略方针和行为是防御性的，一些带有政治及政策色彩的研究趋于把别国的“战略文化”理解为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一般认为苏联的“战略文化”中包含有领土扩张的思想；后冷战时期，在美国，对于中国的传统战略思想及实践问题存有不同认识。有人强调中国战略文化中表现有反现实主义政治的主题，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固有的防御性、反军国主义、强调少使用或不使用暴力的思想，与西方国家的战略传统不相同。另有人认为，中国战略文化中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强硬的现实主义政治倾向。^②这里存在着对中国文化进行客观而正确认识的问题。中国学者对本国的战略文化会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史来看，人们倒是认为美国的“战略文化”中有着强烈的霸权扩张思想的传统根源。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战略文化”来说明国家战略问题时需要适度谨慎，尽可能客观而准确地对一国的“战略文化”进行认识和理解，把文化角度同其他研究角度结合起来，对国家的战略思想及行为进行综合性的探究。

注释：

① 杰克·斯奈德在他的《苏联战略文化：对核选择的含义》（加州，兰德公司，1977年）中首次使用了“战略文化”这一术语。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学者科林·格雷在他的《战略中的国家风格：美国的例子》（《国际安全》杂志，第6卷，第2期，1981年秋季号）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美国风格”这一概念，指的是建立在传统而不是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国家战略思想及实践的习惯。

②③④ 阿拉斯泰尔·约翰斯顿：《思考战略文化》，《国际安全》杂志，第19卷，第4期，1995年春季号，第46页、第36-43页、第45页、第55页的注释。

③④ 伊兹哈克·克雷恩：《战略文化理论》，《比较战略》杂志，第10卷，第1期，1991年，分别见第5页、第5页、第4页。

⑥⑦ 斯蒂芬·彼得·罗森：《军事的有效性》，《国际安全》杂志，第19卷，第4期，1995年春季号，分别见第11页、第7页。